

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

许和连, 吴 钢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文章通过建立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人文差异对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机制, 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 FDI 区位选择偏好两步估计计量模型, 在此基础上, 利用 118 个国家(地区)1992—2010 年的中国 FDI 和人文地理数据估算了各国及地区对中国 FDI 的偏好程度, 检验了人文及地理差距对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中国的人文及地理差距对投资国的 FDI 选择偏好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并且人文差异的作用要远大于地理距离。拥有共同语言是提高各国对中国 FDI 偏好的基础, 而增强价值观认同则是提高各国对中国 FDI 选择偏好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人文价值观; 区位选择偏好

中图分类号:F4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3)01-0122-1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成功的跨国投资项目不仅仅是业务经营进入东道国, 更重要的是其价值理念和公共关系可以融入当地社会。目前, 世界各国居民之间仍存在人文差异, 使 FDI 必须在跨文化环境中从事生产组织及管理经营活动, 因此, FDI 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与沟通。这使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能否将人文差异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来分析其对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 如何估算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 人文差异对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有何影响? 中国应如何正确看待人文差异以更好地吸收和利用 FDI?

目前, 关于人文差异影响 FDI 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主要从 FDI 的交易成本及管理成本展开。一般认为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人文差异通过两国居民的“心理距离”影响 FDI 的区位选择(Dunning, 1981)。当跨国公司进入

收稿日期: 2012-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L040);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110161110028); 湖南省 2011 年研究生研究新项目(CX2011B135)

作者简介: 许和连(1971—), 男, 湖南娄底人,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 钢(1985—), 男, 湖南怀化人,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外市场时,“心理距离”会影响两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使跨国公司管理难度加大(Franke 和 Nadler,2008),尤其是影响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刘兴亚等,2009),从而增加 FDI 的交易和管理成本及其不确定性。潘镇(2006)、Lin(2009)等也均认为文化差异会引起信息不对称,提高 FDI 的成本和风险,进而影响 FDI 的交易效率。“文化距离悖论”则认为文化差异除了给跨国公司带来以上“外来者劣势”之外,也可能通过差异性战略、兼并和学习效应等带来“外来者收益”(Lu 和 Beamish,2004),从而使文化差异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殷华方和鲁明泓,2011)。然而,上述理论分析主要基于逻辑演绎,缺乏系统的数理推导,因而仍未能将人文差异对 FDI 的影响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实证研究则普遍认为人文差异会对 FDI 区位选择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研究主要利用虚拟变量来替代人文差异,如语言和地理距离(包括共同边境)(孙焱林和胡松,2004;Franke 和 Nadler,2008),或以种族、移民、殖民、建交等关系来近似替代人文联系(Gao,2003;张建红,2004;Utpal 和 Peter,2008)。专门基于人文层面探讨 FDI 问题的 Goldberg 等和 Levi(2005)也仅通过地理距离、语言和两国间的人员流动情况来说明国家间的交流与了解是 FDI 区位选择的关键。因此,仍缺乏利用详细的人文差异数据的实证分析。然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Hofstede(2001)及 Inglehart 和 Welzel(2005)的价值观指数已较好地测度了各国间的人文差异。基于此,潘镇(2006)、王俊(2007)、刘兴亚等(2009)、殷华方和鲁明泓(2011)在研究 FDI 时采用了 Hofstede(2001)的指标和数据,但 Inglehart 和 Welzel(2005)的价值观指数则很少涉及。而且,现有研究局限于直接检验人文差异与 FDI 数量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人文差异先影响 FDI 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偏好,再影响 FDI 数量的内在过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做出尝试:首先,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考虑市场均衡的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人文差异对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机理;其次,重视人文差异影响 FDI 的内在过程,在证明引力模型与影响机理模型相对应的基础上,将 Goldberg 等(2005)的两步估计法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中估算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再次,以更为综合的 Inglehart 和 Welzel(2005)价值观指数来反映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人文差异,分析人文差异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人文差异影响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机理分析

FDI 本质上是投资者出于其利益考虑的国际经济活动,因此 FDI 的区位选择其实是选择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直接生产某种商品以谋求更高利润。鉴于此,本文假设东道国在某种商品 Z 上存在特定区位优势(Dunning,1981),可吸引 n 个国家的 FDI。FDI 投资者在投资前都能准确地进行市场评估,评估

标准都是 FDI 的预期收益 π , π 决定于投资生产商品 Z 的净利润, 即销售额减去生产成本和投资前后的交易成本。东道国给予各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生产商品 Z 所需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存在国别歧视, 各国生产商品 Z 的平均生产成本设定为常数 c_1 。但东道国与投资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文和地理距离差异 (d_i), 使各国投资者产生不同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该成本既可能随商品 Z 数量增长, 也可能具有规模效应而与商品数量无关, 为此, 本文将由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所产生的管理和交易成本综合划为两部分: 一部分直接附加到商品 Z 的平均生产成本上, 其比率约定为 $\lambda(d_i)$; 而另一部分则直接设定为 $c_2(d_i)$ 。 $\lambda(d_i)$ 和 $c_2(d_i)$ 都是 d_i 的增函数。据此, 本文以投资商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建立 i 国的 FDI 投资收益最优化模型:

$$\text{Max } \pi_i = p(Z)z_i - c_1 z_i [1 + \lambda(d_i)] - c_2(d_i); i = 1, 2, \dots, n \quad (1)$$

其中, z_i 为 i 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 FDI 所生产的商品 Z 数量, $p(Z)$ 为商品 Z 的市场价格, 它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本文假设商品 Z 为正常品, 其市场需求与价格负相关; 商品 Z 不仅需要满足东道国市场, 也出口其他国家; 各国对商品 Z 的需求弹性基本相同; 各国的商品 Z 消费量与该国的 GDP 正相关。

因此,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商品 Z 的市场需求曲线为: $D = \alpha(Y_0 + \sum_{i=1}^n Y_i) - \beta_d p(Z)$, 其中 Y_0 表示东道国的 GDP, Y_i 表示第 i 个 FDI 来源国的 GDP, α 为各国的商品 Z 消费量与该国的 GDP 的平均比率, β_d 为国际市场对商品 Z 的平均需求弹性。同时, 本文假设商品 Z 主要在东道国境内生产, 商品 Z 的市场供给曲线为: $S = \sum_{i=1}^n z_i + z_0$, 其中 z_0 为东道国自己生产商品 Z 的数量。在市场出清 ($D=S$) 条件下, 商品 Z 的均衡价格可解得:

$$p(Z) = [\alpha(Y_0 + \sum_{i=1}^n Y_i) - (z_0 + \sum_{i=1}^n z_i)] / \beta_d \quad (2)$$

将式(2)代入式(1), 可得:

$$\text{max } \pi_i = z_i \left\{ [\alpha(Y_0 + \sum_{i=1}^n Y_i) - (z_0 + \sum_{i=1}^n z_i)] / \beta_d - c_1 [1 + \lambda(d_i)] \right\} - c_2(d_i) \quad (3)$$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 整理可得:

$$\sum_{i=1}^n z_i = \frac{\alpha n}{n+1} (Y_0 + \sum_{i=1}^n Y_i) - \frac{n}{n+1} z_0 - \frac{c_1 \beta_d n}{n+1} - \frac{c_1 \beta_d}{n+1} \sum_{i=1}^n \lambda(d_i) \quad (4)$$

式(4)表明各国在东道国的 FDI 总量主要由商品 Z 的市场需求量来推动, 但受到商品 Z 在东道国的生产能力 (z_0)、平均生产成本 (c_1)、平均需求弹性 (β_d) 以及各国与东道国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总量 ($\sum_{i=1}^n \lambda(d_i)$) 的共同制约。在以上条件给定的情况下, 各国在东道国的 FDI 总量将是一个固定值,

不会因某一国或某些国家投资策略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变换式(4),可得:

$$z_i = \alpha(Y_0 + \sum_{i=1}^n Y_i) - (z_0 + \sum_{i=1}^n z_i) - c_1 \beta_d [1 + \lambda(d_i)] \quad (5)$$

令 $\omega_{i0} = z_i / (z_0 + \sum_{i=1}^n z_i)$, 代入式(5), 可得:

$$\omega_{i0} = \left\{ \alpha(Y_0 + \sum_{i=1}^n Y_i) - c_1 \beta_d [1 + \lambda(d_i)] \right\} / (z_0 + \sum_{i=1}^n z_i) - 1 \quad (6)$$

考虑到外资大量进入某国生产某种产品往往是因为外资企业具备某些核心比较优势(Dunning, 1981), 而东道国独立生产该产品的能力则较弱, 故不妨将 z_0 忽略不计, 则 $\omega_{i0} \approx z_i / \sum_{i=1}^n z_i$ 。为此, ω_{i0} 可反映 i 国流入东道国的 FDI 占该年东道国 FDI 总量的比重, 即 i 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由于 $c_1 > 0, \beta_d > 0, z_0 \geq 0$ 以及 $\sum_{i=1}^n z_i > 0$, 而 $\lambda(d_i)$ 是一个增函数, 因此 $\partial \omega_{i0} / \partial d_i < 0$, 即 i 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与 i 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负相关。然而, $\partial \omega_{i0} / \partial Y_i > 0$, 这意味着 i 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可能与投资国的综合国力优势有关, 它不能直接反映 FDI 选择偏好, 有必要进一步提炼直接反映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参数。

在开放经济体系中, 一国的 GDP 按支出项目往往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个部分。鉴于 FDI 是投资的一部分, 本文假设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投资的比重相同, 都为 $\theta (0 < \theta < 1)$, 同时将政府购买、净出口以及用于商品 Z 以外的消费之和以 k_i 进行简化处理, 于是各国的 FDI 为 $F_i = \theta[(1 - \alpha)Y_i - k_i]$, 而 $Y_i = F_i / [\theta(1 - \alpha)] + k_i / (1 - \alpha)$ 。令 $K = \sum_{i=0}^n k_i$, 可得:

$$(Y_0 + \sum_{i=1}^n Y_i) = \frac{1}{\theta(1 - \alpha)} (F_0 + \sum_{i=1}^n F_i) + \frac{K}{1 - \alpha} \quad (7)$$

将式(7)代入式(6), 可得:

$$\omega_{i0} = \left\{ \frac{\alpha}{\theta(1 - \alpha)} (F_0 + \sum_{i=1}^n F_i) + \frac{\alpha}{1 - \alpha} K - c_1 \beta_d [1 + \lambda(d_i)] \right\} / (z_0 + \sum_{i=1}^n z_i) - 1 \quad (8)$$

由于 $(F_0 + \sum_{i=1}^n F_i)$ 代表全球各国的 FDI 总量, 而 $\sum_{i=1}^n z_i$ 可以反映流入东道国的 FDI 总量, 令 $\omega_{iw} = (F_0 + \sum_{i=1}^n F_i) / z_0 + \sum_{i=1}^n z_i$, 代入式(8)可得:

$$\omega_{i0} = \frac{\alpha}{\theta(1 - \alpha)} \omega_{iw} + \left\{ \frac{\alpha}{(1 - \alpha)} K - c_1 \beta_d [1 + \lambda(d_i)] \right\} / (z_0 + \sum_{i=1}^n z_i) - 1 \quad (9)$$

由于 $\frac{\alpha}{\theta(1 - \alpha)}, c_1 \beta_d, (z_0 + \sum_{i=1}^n z_i)$ 和 K 都是模型的外生控制变量, 令 $c =$

$[\frac{\alpha}{(1-\alpha)}K - c_1\beta_d]/(z_0 + \sum_{i=1}^n z_i) - 1$, 将式(9)简化处理得:

$$\omega_{i0} = \frac{\alpha}{\theta(1-\alpha)}\omega_{iw} - c_1\beta_d\lambda(d_i)/(z_0 + \sum_{i=1}^n z_i) + c \quad (10)$$

根据 $0 < \alpha < 1$ 且 $0 < \theta < 1$, 可得 $\partial\omega_{i0}/\partial\omega_{iw} > 0$, 这表示 i 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与 ω_{iw} 在理论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令 $R_i = \omega_{i0} - \alpha\omega_{iw}/[\theta(1-\alpha)]$, 因为 i 国在东道国的相对投资强度剔除掉其在全球的相对投资实力的影响, 即剔除掉该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影响, 从而可反映各国 FDI 对东道国的区位选择偏好。^① 从式(10)可知, $R_i = c - c_1\beta_d\lambda(d_i)/(z_0 + \sum_{i=1}^n z_i)$, 而 $\frac{\partial R_i}{\partial d_i} = -c_1\beta_d/(z_0 + \sum_{i=1}^n z_i) \times \frac{\partial\lambda(d_i)}{\partial d_i}$ 。由于 $c_1 > 0, \beta_d > 0, z_0 \geq 0$ 以及 $\sum_{i=1}^n z_i > 0$, 而 $\lambda(d_i)$ 是一个增函数, 易推得 $\partial R_i/\partial d_i < 0$, 这意味着东道国与各国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将对各国的 FDI 区位选择偏好产生负面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世界各国 T 年内对某国的 FDI 选择偏好差异, 为此将初始的引力模型变换为面板数据模型:

$$\ln F_{i0t} = \alpha_0 + \alpha_1 \ln Y_{it} + \alpha_2 \ln Y_{0t} + \alpha_3 \ln d_i + \epsilon_{it} \quad (11)$$

其中, F_{i0t} 表示 i 国第 t 年在东道国的投资额, Y_{it} 表示 i 国第 t 年的 GDP, Y_{0t} 表示东道国第 t 年的 GDP, d_i 表示 i 国与东道国的人文地理距离(一般不随时间变化)。令 $F_{0t} = \sum_{i=1}^n F_{i0t}, Y_t = Y_{0t} + \sum_{i=1}^n Y_{it}$, 变换式(11)可得:

$$\ln \frac{F_{i0t}}{F_{0t}} = \alpha_0 + \alpha_1 \ln \frac{Y_{it}}{Y_t} + \alpha_2 \ln Y_{0t} + \alpha_3 \ln d_i + (\ln F_{0t} - \alpha_1 \ln Y_t) + \epsilon_{it} \quad (12)$$

根据 $Y_i = \frac{(F_i + k_i)}{\theta(1-\alpha)}, Y_t = \frac{(F_{0t} + \sum_{i=1}^n F_{it}) + K_t}{\theta(1-\alpha)}$, 可得 $\frac{Y_{it}}{Y_t} = \frac{F_{it} + k_i}{(F_{0t} + \sum_{i=1}^n F_{it}) + K_t}$, 而 $\ln \frac{F_{it} + k_i}{F_t + K_t} \approx \ln \frac{F_{it}}{F_t} (F_t = F_{0t} + \sum_{i=1}^n F_{it})$, 其偏差仅与时间有关, $\alpha_2 \ln Y_{0t}$ 和 $\ln F_{0t} - \alpha_1 \ln Y_t$ 也都仅随时间变化。为此, 令 $\gamma_t = \alpha_2 \ln Y_{0t} + (\ln F_{0t} - \alpha_1 \ln Y_t)$, 以其作为时间固定效应可较好地概括仅随时间变化的偏差。式(12)调整为:

$$\ln \frac{F_{i0t}}{F_{0t}} = \alpha_0 + \gamma_t + \alpha_1 \ln \frac{F_{it}}{F_t} + \alpha_3 \ln d_i + \epsilon_{it} \quad (13)$$

其中, F_{it}/F_t 表示 t 年 i 国流出的 FDI 总额占该年全球 FDI 流出总量的比重, 即 i 国在全球的相对投资实力。为此, 式(13)与式(10)相对应。在此基础上, 本文借鉴 Goldberg 等(2005)的两步估计法, 并将其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中,^② 先估算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程度, 再检验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对该偏好的影响。鉴于国家之间的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在时间上基本稳定, 令 $\varphi_i = \alpha_3 \ln d_i$, 式(13)可转换为:

$$\ln \frac{F_{i0t}}{F_{0t}} = \alpha_0 + \gamma_t + \varphi_i + \alpha_1 \ln \frac{F_{it}}{F_t}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其中, α_0 代表各国在东道国的 FDI 平均投资强度, γ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φ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它可以反映在控制投资实力影响的情况下 FDI 投资国对东道国的区位选择偏好水平。一般而言, φ_i 越大, i 国 FDI 对东道国的偏好程度越大。为此, 如果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显著, 则证明各国在东道国存在明显的 FDI 区位选择偏好差异。由于 F_{i0t}/F_{0t} 和 F_{it}/F_t 都是比例值, 对其取对数将难以解释参数 α_1 的经济意义, 而且对数化处理也使虚拟变量及某年在中国无 FDI 的国家难以纳入模型, 因此, 本文将式(14)修改为:

$$\frac{F_{i0t}}{F_{0t}} = \alpha_0 + \gamma_t + \varphi_i + \alpha_1 \frac{F_{it}}{F_t} + \varepsilon_{it} \quad (15)$$

通过估算式(15)得出 φ_i , 再将 φ_i 对各种人文地理指标进行回归, 也即:

$$\varphi_i = \beta_0 + \beta_1 X_{i1} + \beta_2 X_{i2} + \dots + \beta_k X_{ik} + u_i \quad (16)$$

其中, k 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 X_{ik} 代表各种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指标及其交叉项。

(二)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 1992—2010 年 118 个国家(地区)^③ 对中国的 FDI、FDI 流出总量和价值观差异以及地理距离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各国在中国的相对投资实力 (F_{i0t}/F_{0t} , FIC, 单位: %) 由各国 t 年对中国 FDI (F_{i0t}) 除以中国 t 年吸收的 FDI 总额 (F_{0t}) 计算得出。其数据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95—2008 年) 和《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0 年) 公布的 FDI 实际发生额 (单位: 万美元) 整理得到。^④ 各国在全球的相对投资强度 (F_{it}/F_t , FIW, 单位: %) 由各国 t 年的 FDI 流出总量 (F_{it}) 除以全世界 t 年的 FDI 流出总量 (F_t) 计算得出。其数据根据 UNCTAD 公布的 1992—2010 年各国 FDI 流出量 (单位: 百万美元) 整理得到。^⑤

人文差异主要以语言和价值观指标来衡量。语言变量反映各国与中国是否存在较大的语言差异。如果一国至少有 9% 的人使用汉语, 则 $Coml = 1$, 否则 $Coml = 0$, 其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CEPII) 数据库。价值观指标以 Inglehart 和 Welzel (2005) 的国家两层面价值观指数来测度, 即传统价值观和世俗理性价值观 (TRV) 及生存价值和自我表现价值观 (SSV) 两个层面。^⑥ 本文采用距离公式 $DWVS_0 = \sqrt{(TRV_i - TRV_0)^2 + (SSV_i - SSV_0)^2}$ 计

算 i 国与中国之间的价值观整体距离,以反映两国的价值观综合差异。

地理方面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是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ist),以 Head 和 Mayer(2002)计算的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理加权距离来表示(单位:公里);二是国家是否相邻(Ctig),即各国与中国是否存在边界上的邻接,如果一国与中国相邻,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以上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人文地理因素数据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各国对中国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

表 1 给出了式(15)的基本估计结果。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表明模型仅存在个体固定效应。为此,(1.1)仅控制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各国的相对投资实力(FIW)对其在中国的相对投资强度(FIC)影响显著,但解释力度有限,模型的组内和组间 R^2 仅分别为 0.016 和 0.079。但(1.1)调整后的 R^2 较大,意味着个体固定效应对模型的解释力度更大,各国对中国 FDI 选择偏好确实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有必要用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等仅随个体变化的因素来进行解释。

为保证估计结果在误差项存在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的情况下稳健,(1.2)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并用 White 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1.3)和(1.4)则进一步采用自回归项 AR(1)和 AR(2)。(1.2)相对于(1.1)的 t 值明显增大,而 R^2 和 F 检验值有所减少,较好地校正了异方差问题。而(1.3)和(1.4)的整体解释力度有所提升,并且 AR(1)和 AR(2)的估计系数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国对中国的相对投资强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自我强化作用(黄肖琦、柴敏,2006)。由于 FDI 自我强化作用不一定是人文差异导致的持续投资偏好,也可能是投资者维护商务关系的结果,为排除此可能性,本文采用(1.4)的个体固定效应来衡量各国对中国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

表 1 式(15)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1.1) ^a	(1.2) ^b	(1.3) ^b	(1.4) ^b
常数项	0.701***	0.813***	0.833***	0.834***
FIW	0.163***	0.028***	0.005*	0.004*
AR(1)			0.664***	0.669***
AR(2)				0.076**
调整后的 R^2	0.910	0.627	0.854	0.912
D.W.值	0.196	1.169	2.263	2.003
观测值	2 242	2 242	2 124	696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注:(1)^a采用最小二乘法,^b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并使用 White 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计量软件为 Eviews6.0;(2)***、**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 3、表 4 同。

表 2 给出了各国对中国 FDI 的偏好程度。从中可见,各国对中国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存在明显差异,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程度小于 0,低于各国在中国的 FDI 平均投资强度,只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特别突出。其中,与中国大陆人文关系密切的中国香港和有 25% 的注册机构与中国企业有密切联系的维尔京群岛最偏好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与中国有着紧密历史文化渊源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 FDI 偏好也普遍较高。非洲最偏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是毛里求斯,因为它无任何外汇管制且有 2.9% 的华裔,开曼群岛和萨摩亚与之类似。此外,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荷兰的跨国公司可以较好地处理和解决人文差异问题,也较偏好直接投资于中国。综合来看,人文差异是导致 FDI 投资偏好差异的重要因素,与中国人文差异越小、人文关系越紧密的国家越偏好对中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

表 2 各国(地区)对中国大陆 FDI 的偏好程度

i	国家(地区)	φ_i	i	国家(地区)	φ_i	i	国家(地区)	φ_i	i	国家(地区)	φ_i
亚洲											
1	中国香港	39.787	31	也门共和国	-0.828	60	瑞士	-0.461	90	巴拿马	-0.761
2	日本	6.350	32	叙利亚	-0.832	61	瑞典	-0.614	91	巴西	-0.796
3	韩国	4.149	33	哈萨克	-0.831	62	西班牙	-0.637	92	伯利兹	-0.809
4	中国台湾	2.989	34	吉尔吉斯	-0.832	63	丹麦	-0.613	93	阿根廷	-0.826
5	新加坡	4.524	非洲			64	比利时	-0.747	94	墨西哥	-0.825
6	中国澳门	-0.187	35	毛里求斯	0.137	65	奥地利	-0.713	95	智利	-0.829
7	马来西亚	-0.241	36	南非	-0.768	66	卢森堡	-0.699	96	巴拉圭	-0.831
8	菲律宾	-0.600	37	尼日利亚	-0.820	67	俄罗斯	-0.789	97	玻利维亚	-0.829
9	泰国	-0.624	38	塞舌尔	-0.766	68	芬兰	-0.755	98	委内瑞拉	-0.831
10	印度尼西亚	-0.644	39	纳米比亚	-0.828	69	匈牙利	-0.802	99	古巴	-0.831
11	文莱	-0.625	40	马达加斯加	-0.832	70	罗马尼亚	-0.809	100	秘鲁	-0.831
12	阿联酋	-0.751	41	埃及	-0.829	71	挪威	-0.800	101	哥伦比亚	-0.833
13	沙特阿拉伯	-0.682	42	利比里亚	-0.846	72	爱尔兰	-0.791	102	牙买加	-0.832
14	印度	-0.794	43	阿尔及利亚	-0.832	73	捷克	-0.815	103	哥斯达黎加	-0.834
15	以色列	-0.807	44	津巴布韦	-0.833	74	葡萄牙	-0.817	104	洪都拉斯	-0.831
16	土耳其	-0.822	45	喀麦隆	-0.833	75	希腊	-0.825	105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0.832
17	柬埔寨	-0.821	46	塞拉利昂	-0.833	76	波兰	-0.825	106	多米尼加	-0.832
18	塞浦路斯	-0.824	47	肯尼亚	-0.833	77	乌克兰	-0.827	107	厄瓜多尔	-0.833
19	科威特	-0.862	48	摩洛哥	-0.834	78	斯洛伐克	-0.831	北美洲		
20	约旦	-0.829	49	几内亚	-0.832	79	保加利亚	-0.827	108	美国	4.320
21	巴基斯坦	-0.828	50	多哥	-0.834	80	南斯拉夫	-0.831	109	加拿大	0.773
22	孟加拉国	-0.831	51	博茨瓦纳	-0.833	81	马耳他	-0.832	110	百慕大	-0.368
23	朝鲜	-0.829	52	坦桑尼亚	-0.834	82	冰岛	-0.834	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		
24	越南	-0.830	53	利比亚	-0.835	83	立陶宛	-0.834	111	萨摩亚	0.852
25	伊朗	-0.825	54	加纳	-0.833	84	阿塞拜疆	-0.834	112	澳大利亚	-0.195
26	黎巴嫩	-0.831	欧洲			85	白俄罗斯	-0.834	113	新西兰	-0.720
27	老挝	-0.830	55	德国	1.039	拉丁美洲			114	马绍尔群岛	-0.801
28	伊拉克	-0.832	56	英国	1.035	86	维尔京群岛	11.070	115	库克群岛	-0.826
29	斯里兰卡	-0.833	57	荷兰	0.347	87	开曼群岛	1.492	116	汤加	-0.833
30	蒙古	-0.831	58	法国	0.336	88	巴巴多斯	-0.504	117	巴布亚新几内亚	-0.834
			59	意大利	-0.338	89	巴哈马	-0.704	118	斐济	-0.834

(二)人文差异对 FDI 选择偏好的影响效应

表3中(3.1)将地理距离、国家相邻、语言、价值观整体距离及其交叉项同时引入式(16)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能够联合解释各国在中国FDI近32%的偏好差异,但其估计系数都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地理距离和价值观整体差异的估计系数与理论相悖,这是因为地理距离和人文差异存在较大相关性,使(3.1)中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将人文指标和地理指标分别引入式(16)进行OLS估计。(3.2)的结果显示,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对中国FDI偏好整体上较不相邻国家高出近2.781个百分点,但地理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整体解释力度也较低。这说明在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地理距离产生的运输成本越来越对FDI缺乏约束力。而(3.3)中人文差异指标对各国在中国FDI偏好差异的联合解释力度及其系数估计值与(3.1)非常接近,这说明人文差异对各国在中国FDI偏好差异的影响远远高于地理距离,人文差异是导致各国在中国FDI存在较大偏好差异的关键。其中语言差异显著影响各国对中国的FDI偏好,如果一国有较大比例的人熟悉汉语,那么该国对中国FDI偏好将大幅提升。而价值观差异则对各国对中国FDI偏好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当两国在语言上可以较大程度进行交流时,这种影响将显著增强。

表3 人文差异对FDI选择偏好的影响

	(3.1) ^a	(3.2) ^a	(3.3) ^a
常数项	-0.951	0.362	-0.468
Dist	0.032	-0.070	
Ctig	0.997	2.781**	
DWVS	0.071		-0.023
Coml	15.643***		15.947***
Coml×DWVS	-6.234***		-6.510***
调整后的R ²	0.320	0.043	0.328
观察值	118	118	118

为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同时考虑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分别将人文和地理指标引入式(15)中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中的(4.1)和(4.2)。从估计结果看,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因素的系数估计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仍是人文差异对FDI区位选择偏好的整体解释力度较强。这进一步说明影响各国对中国FDI偏好的关键是语言 and 价值观差异,文化差异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地理距离。考虑到有必要排除FDI的自我强化作用,但在模型中引入AR项将导致仅随个体变化的人文地理变量的估计值失效,为此,本文借鉴黄肖琦、柴敏(2006)的方法在模型中引入FIW的一阶和两阶滞后项,结果见(4.3)和(4.4)。不难发现,在控制了FDI自我强化作用之后,人文指标的系数及其估计值依然稳定。这意味着人文差异作为隐性的非制度壁垒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发挥着根深蒂固的作用。而且,(4.4)的拟合优度明显低于(3.3),说明直接用人文差异指标来解释FDI数量,确实忽视了人文差异影响FDI的

内在过程,从而导致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有限。这个结果支持了本文关于人文差异首先影响 FDI 区位选择偏好然后才影响 FDI 数量的判断,证实了先估算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再检验人文差异的影响的合理性。

表 4 各国对中国 FDI 选择偏好模型的估计结果

	(4.1) ^b	(4.2) ^b	(4.3) ^b	(4.4) ^b
常数项	0.093***	0.016***	0.108***	0.014***
FIW	0.162***	0.137***	0.070**	0.059***
Dist	-0.008***		-0.010***	
Ctig	0.133***		0.095***	
DWVS		-0.005***		-0.004***
Coml		14.759***		14.829***
Coml×DWVS		-6.307***		-6.224***
FIW(-1)			0.064**	0.056***
FIW(-2)			0.072***	0.060***
调整后的 R ²	0.182	0.251	0.238	0.294
观测值	2242	2242	2006	2006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考虑市场均衡的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人文差异影响 FDI 区位选择偏好的机理,指出一国在东道国的 FDI 相对投资强度由其在全球的相对投资强度及其与东道国的人文地理距离共同决定,人文差异和地理距离对各国的 FDI 区位选择偏好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本文还基于引力模型论证了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估算外商直接投资偏好的有效性,将 Goldberg 等(2005)的两步估计法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 118 个国家(地区)1992—2010 年的 FDI 面板数据和人文地理数据估算了各国在中国 FDI 的区位选择偏好,发现各国在中国 FDI 的选择偏好存在明显差异。通过检验人文地理因素对各国在中国 FDI 选择偏好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人文差异的影响效应远高于地理距离,影响各国对中国 FDI 选择偏好的关键因素是语言和价值观差异,拥有共同语言是提高各国对中国 FDI 偏好的基础,而增强价值观认同则是重要推动力。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但由于中国与各国存在明显的人文差异,中国在引资过程中需要重视增强相互之间价值观念的认同与融合,才能更好地保证“引资”的稳定性和“用资”的有效性。同样,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也需要特别重视和理解外国的人文价值差异,这样才能稳固扎根于国外市场,保证能够“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中国在培养跨国型人才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外语的学习和训练,更需要重视培养跨文化的情怀与素养。而且,中国具有独特文化底蕴,在重视国际文化认同和融合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认同中国,进而让各国从更广和更深层

面与中国进行更有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注释:

- ①如果一国在全球的 FDI 比重小于 1%，但在东道国的投资比重超过 1%，则意味着该国较偏好到东道国投资。
- ②Goldber 等(2005)的方法是基于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直接将残差作为 FDI 区位选择的偏好水平,但如此提取不能确保偏好水平是否仅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因此,用仅随个体变化的人文地理指标将存在较大偏差。而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可概括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且仅随个体变化的非观测异质性,故有必要将该方法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中。
- ③本文最终选取的 118 个国家(地区)在 1992—2010 年对中国 FDI 总额占其所在大洲对中国 FDI 总额的比重基本都超过 97%，而且这些国家历年整体的 FDI 流出量占全球 FDI 流出总量的比重历年都近 98%，故这些国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 ④1992—1996 年和 2010 年我国的分国别 FDI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而 1997—2009 年数据则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对比互补、勘误后得到。
- ⑤印度尼西亚 1992—2002 年的 FDI 流出量数据包括东帝汶,但 2003 年以后不包括;南斯拉夫虽从 2003 年解体,但《中国统计年鉴》保持以此名称统计该地区在中国的 FDI,为此,本文以 UNCTAD 中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加总数据来计算其 FDI 流出量。
- ⑥TRV 和 SSV 的数据集包括 98 个国家和地区 5 个时期的价值观得分,取值范围都定在 -2 和 2 之间,考虑到价值观得分在时间上较为稳定,本文取其所有时期得分的均值。而数据缺失的国家则根据其相邻国家以及存在殖民关系的国家价值观数据进行近似估算。

参考文献:

- [1]黄肖琦,柴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 FDI 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6,(10):7—13.
- [2]刘兴亚,李湘宁,缪仕国,姜子叶.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与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09,(3):72—84.
- [3]潘镇,鲁明泓.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文理解释[J].世界经济,2006,(2):51—61.
- [4]孙淼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4,(10):60—64.
- [5]王俊.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99—105.
- [6]殷华方,鲁明泓.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 型曲线假说[J]. 南方经济,2011,(1):26—38.
- [7]张建红.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J]. 世界经济,2004,(1):16—22.
- [8]Bhattacharya U,Grozhi k P.Melting pot or salad bowl;Some evidence from U.S.investments abroad[J].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2008,11(3):228—258.

- [9]Dunning J H.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81.
- [10]Franke G R,Nadler S S.Cul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thical attitud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8,61(3):254—264.
- [11]Gao T.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3,14(4):611—629.
- [12]Goldberg M A,Heinkel R L,Levi M.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human dimen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5,24(6):913—934.
- [13]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CA:Sage Publications,2001.
- [14]Inglehart R,Welzel C.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 [15]Lin A Y.Law, culture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J].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8,19(3):323—341.
- [16]Lu J W,Beamish P W.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S-Curve hypothesi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4):598—609.

Humanistic Differences and FDI Location Preferences

XU He-lian, WU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umanistic differences on FDI location preferences based on a game theory model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nstructs a two-step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panel data to estimate the FDI location preferences. Then it employs the data of 118 countries from 1992 to 2010 with regard to FDI into China, humanity and geography to calculate their preferences for FDI into China and tests the effects of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 gaps on FDI location preferen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 gap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s investors and China have strong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location preferences and humanistic difference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FDI than geographic distances. The share of common interests is the basis of the rise in FDI into China, and the enhancement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i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the rise in FDI into China.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umanistic value; location preference
(责任编辑 周一叶)